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Overseas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丛书主编：魏海生

执政的转型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countrysid
implemen
rural refor
the village
the village
of the vill
aims of un
various an
sanitation
democrac
maintaini
populace.
The ne
from the p
state-own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 Governance

吕增奎 主编

Overseas Academ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Overseas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丛书主编：魏海生

执政的转型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吕增奎 主 编
张利军 赵 超 副主编

Overseas Academ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吕增奎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8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魏海生主编)

ISBN 978-7-5117-0692-8

I. ①执…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684 号

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出 版 人 和 龔

丛书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总 序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世界上到处都在述说着“中国故事”。2009年，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提出“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与此相反，2010年，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戈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甚至将走向崩溃。至此，关于中国的“统治说”与“崩溃说”在全球文化语境中各执一端、相互矛盾，这其中包含多少学理上的探究和现实中的策略尚待更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当代全球体系下，“中国”已成为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词汇，“中国研究”正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力图让海外学者的视角、眼光更多地投射到我们的视界，使我们听到更多的来自世界的各种声音，而这种眼光与声音越真切清晰，越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与辨析，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以多重向度理解自身的借镜。

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已深置于全球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各个领域的跨国化进程使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显得愈加紧密而复杂，作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某种有别于其传统功能的方式，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关系体系。而历史上两大阵营的关系模式，以及后来的三个世界模式、中心/边缘理论等都无法诠释当代世界的复杂图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建构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参照系，多向度地反观时代，主动寻求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精神资源，既是各国经历现代性进程中的共同命题，同时，作为现代性共同体，藉此过程辨清自身的方位也更显必要。康德曾用“先验幻象”的概念指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使命，我们也有责任对某种封闭的执信保持警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在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中国领导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充满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警示全党：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面对“四种考验”、“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加理性地、更加包容地听取不同的声音，关注来自国内外各方学者的思想成果。这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这样一重思想话语与认识维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固有的视域之外窥到自身的盲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国家的认识；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文明视角下的内在逻辑，从而更有效地思考自身相应的策略，同时，这种认识上的互补性也可导向多种精神资源共同面对和审理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层意义的解读，进而与当代全球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馈。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

更加全面地展开。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最具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关照。

可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海外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几个重要问题领域的观察与回应，同时，也从知识论、方法论的层面带来了多元化的问题线索和认识方式。丛书所选论著的诸位专家学者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度，分属于不同的思想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所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因此，其观点本身既包含着深刻的见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在观点与观点之间，既有共识，又有对立，既有交叉点，也有相悖处。事实上，这些又恰恰反映出问题对象的当下性与可讨论性。另一方面，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相互抵牾的结论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阐发也的确需要经受这样的一种检验。就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复杂结构而言，很难以某种单一固定的结论将问题进行整体性化约，因此，编选这套海外学者的学术论丛，我们着力呈现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元的论证角度和对问题的探寻过程，从而在比较宽阔的视域内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成果并置于一个开放式结构中，既是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审慎和包容，也力图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与思维向度。

我们看到，由中国引发的世界回响仍在持续，我们的丛书也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一个陆续编选、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

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另外，该丛书所选文章的观点均为作者观点的客观呈现，不代表丛书编者的认识倾向。

谨序。

魏海生

2011年7月5日于北京

导言 海外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研究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研究主要内容，出现了一批迄今为止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乃至经典性的研究著作。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动向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分析，但不再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主题，甚至可以说是遭到了忽视。经过将近20多年后的沉寂后，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重新回到西方学者的视野之中，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发出了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尽管近10年来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难以说是热门主题和专门领域，但却呈现出逐渐升温之势，出现了一些在西方产生广泛反响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为何没有按照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西方学者所预测的轨迹演变？中国共产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面临哪些挑战，将会走向何方？这些是近10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关注和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关注

2002 年，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了题为“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治理的？”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呼吁，改变西方学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忽视和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状况，主张把中国共产党重新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焦点。自从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执政机制、发展演变、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未来前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例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化的前景》（*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2003）和《财富变成权力：中国共产党对私人部门的接收》（*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2008）、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柏斯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共同编辑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2006）美国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整》（*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2008）、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的《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2009）、弗兰克·N. 皮克（Frank N. Pieke）的《优秀党员：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假设》（*The Good Communists: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2009）和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 2010）等。

西方学者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

而在 2000 年后又重新加以关注呢？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西方政治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政党研究是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因此，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主流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后，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变成国家 - 社会关系研究，80 年代的研究侧重点是国家 - 社会关系中的国家方面，而 90 年代则是国家 - 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方面，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学者着重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正是这种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视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不到西方政治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①

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简单化看法。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使西方的许多观察家和学者产生了这样的预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他们迟早会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让位于他们。简单地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化，最终带来政治民主化。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促使西方许多观察家再一次认为，即中国共产党不久将步上它们的后尘，走上崩溃之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②正是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使得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怎么关注中国共产党。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20 世纪 80 年末，中国在地方引入了村民选举，进入 90 年代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兴起。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这些发展和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从中寻找中国民主化的种子和动力，因而纷纷投身于其中进行研究。村民选举和非政府组织成为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主题，我们可以看

① 参见 Kjeld Erik Brødsgaard & Zheng Yongnian,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pp. 4 - 5, p. 57.

②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Anatomy of Collapse", September 26, 1991,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5 - 9.

到，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西方学者大量关于村民选举和非政府组织的著述，从而冲淡和分散了中国共产党研究。

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忽视，西方的许多人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许多政治改革和党内改革，认为中国基本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失去执政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改革中凋零、停滞或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而正采取措施改造自身，维护自身的长期执政地位。这证明“西方许多人，包括中国专家在内，似乎对中共的角色、它的历史、它目前的组织结构等，普遍存在很大误解”^①。关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识，正如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党控制着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互联网会推翻党”、“其他国家希望复制中国模式”和“党不能永远统治下去”。^②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些错误认识和判断的根源在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宣布放弃中国共产党研究还为时过早，因而必须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的焦点^③。另一个促使西方学者重新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 7000 多万名党员，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途的执政党，还掌握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变化和政策举措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还影响着整个世界。

① 参见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30_br8_friendsandenemies.shtml。

② Richard McGregor, “5 Myth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1.

③ 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凯瑞·布朗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关注焦点，参见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30_br8_friendsandenemies.shtml。

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

中国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些变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否保住权力？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适应变化？这是西方学者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例如 1996 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 罗文（Henry S. Rowen）认为，中国到 2015 年将会实现民主化^①；“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 2010 年被推翻^②。然而，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现实粉碎了这些预测。正如凯瑞·布朗所评论的那样：“许多权威专家预言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和不可持久的，许多次发出了即将崩溃的警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讨论和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③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控制有所弱化，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

^① Henry S. Rowen,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45, Fall 1996, p. 61.

^②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③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hem Press, 2009, p. 22.

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①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 (Maria Edin) 认为, “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 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 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 已经证明了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② 布鲁斯·迪克逊认为, 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 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分子入党, 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等。^③

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 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增强了政党-国家体制 (Party-state) 的适应性, 维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认为, 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 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 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 第一, 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 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第二, 新兴社会力量出现, 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第三, 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 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 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第五, 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 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 (homogeneous)

① 参见 Alexei Shevchenko,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No. 2, 2004, pp. 161-85.

② Maria Edin, “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 No. 1, 2003, p. 4.

③ Bruce j.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in Chae-ho Chŏ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22-24.

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①

与海贝勒不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政党－国家体制”收缩表现在思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传统的控制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萎缩和遭到侵蚀，全球化和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多方面交往又进一步削弱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此外，党也面临着许多紧迫的挑战，例如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广泛的腐败、普遍的失业、犯罪率的上升和农村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第一，中国共产党全面、广泛和深刻地吸取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以及其他一党制国家（包括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失败的教训。中国对这些国家失败教训的研究并不是一项抽象的学术研究，而是有选择地借用、采纳并转化成为本国的制度和实践。第二，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教训在意识形态（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活动，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思想。这些理论创新充当了党一系列加强其组织机构和能力的实践努力的理论基础。第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采取了各项措施：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入党，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展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评估和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内纪律，打击党内腐败；重建地方党支部；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扩大党内民主，试行竞争性的地方党委选举，鼓励各级党委同公众的协商和党委内部的争论；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素质，等等。

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

^①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页。

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因此，沈大伟认为，这些政治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①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理论目前是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正在流行的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然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挑战：

第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难以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环境恶化变得非常严重，而且带来了失业和不平等严重的问题。

第二，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定会加剧，并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8700起增至每年7.4万起，2005年则增加到了8.7万起。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正如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所认为的那样，“到21世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 9.

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日常特征”。^① 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并且“政府的失灵致使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②

第三，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取代共产主义来填充意识形态真空和重新合法化自身的意识形态手段。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必定是更民族主义的”。^③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④ 然而，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⑤

第四，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尽管中国从腐败产生之日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就目前来看，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但没有稳定下来，反而更加恶化了。不过，即使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难言“胜利”，但是也没有恶化到“吞噬掉中国共产党”的地步，至多是打了个“平手”。^⑥ 在西方学者看来，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致命弱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⑦

① Thomas Bernstein, *Unrest in Rural China: A 2003 Assessment*, August 1, 2004,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

② Murray Scot Tanner, “China Rethinks Unre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7: 3, 2004, pp. 138 and 146.

③ Th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46.

④ Robert Weatherley, *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 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 p. 153.

⑤ Ibid., pp. 12-13.

⑥ Andrew Wedeman, “Win, Lose, or Draw? China’s quarter century war on corruption,”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 49, No. 1, 2008, p. 24.

⑦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London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330-336.

总而言之，由于国家能力下降而无力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社会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组织性日益增强，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造成了中国政权的深度合法性危机。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的转型。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①然而，西方也有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②

四、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大多都对政治的民主化感兴趣，许多西方学者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前景。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把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是否会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而已，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垮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一些西

^① Joseph Fewsmith,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p. 34.

^② Bo Zhiyue, "China's Model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1, No. 1, January 2010, p. 117.